

地位寻求、角色构建与英国脱欧后的对外政策调整^{*}

孙志强 张蕴岭

内容提要:国家的寻求地位行为会导致国家对外政策的调整。在具有等级特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会根据自身实力和客观环境,寻求合适的国家地位。在确定地位目标后,国家会匹配相应的角色,并面对国际观众和国内观众进行角色扮演。而国家的角色扮演,就是国家对外政策选择及调整的过程。从地位寻求到角色构建再到对外政策调整的整个传导链条,是国家在与国际、国内观众互动的情境下,其对外行为的逻辑自洽过程。本文建构了一个整体解释框架,意在阐释国家的地位寻求、角色构建与对外政策调整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以及传导机制。按照该框架的解释,英国在脱欧后寻求全球性大国地位,并扮演了美国忠实盟友、欧盟区域伙伴、全球贸易大国、“盎格鲁圈”协调者、英联邦领导者、民主价值观维护者等国家角色,由此带来对外政策的显著调整。

关键词:地位寻求 角色构建 角色扮演 对外政策 英国脱欧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全民公投选择退出欧盟。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结束了长达47年的欧盟成员国身份。英国脱欧后,在国际体系中寻求何种地位?在地位寻求过程中,它扮演了哪些国家角色?这又如何影响其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下文拟在清晰界定国家地位、国家角色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二者的相互关系,然后设计一个整体解释框架,来阐释国家的地位寻求、角色构建和对外政策调整的过程。

一 核心假设及解释框架

国家地位、国家角色概念及相关理论的提出,为解释国家对外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二者借鉴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观点,将权力/物质因素、制度/规范因素、观念/认知因素有机结合,从而形成国家对外政策的独立激励结构,弥补主流理论在国家对外政策解释方面的不足。

既有研究对于国家地位、国家角色如何影响一国对外政策,已有诸多解释。但国家地位、国家角色概念并未得到清晰阐释,还经常与国家身份、国家形象、国家声誉等概念混淆使用。同时,对国家地位、国家角色、国家对外政策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亦相对缺乏。简言之,从国家地位寻求到国家对外政策变化的发生过程中,既有研究忽略了国家角色构建这一重要的中间环节。譬如,在崛起国由于地位不满而与守成国发生冲突的过程中,崛起国会根据地位目标,构建起挑战者、竞争者、破坏者等国家角色。而崛起国的角色塑造及角色扮演就表现为其对外政策的变化。

对于国家为何会构建起某种国家角色,现有研究多从该国的历史文化、物质能力、政治制度、决策者偏好等因素考量,^①但却缺乏从国家地位因素考量的视角。而对于国家为何在某些时期,其国家角色定位和转换非常激烈,而在另一些时期,国家角色却能保持相对平稳,既有研究亦无法给出合理解释。本文认为,这正是由于该国在不同时期国家地位稳定性的不同所导致的。因此,国家地位是国家角色构建的内在驱动力,在分析国家角色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关系时,应首先考虑国家地位因素。

综上,可设计一个整体解释框架,来分析一国的地位寻求、角色构建与对外政策调整三者之间的作用机理及传导机制。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做出如下假设:在具有等级特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首先会寻求在其中的合适地位,并匹配相应的国家角色。然后,国家会根据角色定位,面对国际观众和国内观众进行角色扮演。该国的角色扮演过程,也就是该国对外政策选择及调整的过程,而且此过程可通过信号传递机制来进行描述。由此,国家角色作为中介变量,在整体解释框架中起到“桥梁”的作用,可将国家地位寻求与国家对外政策调整有机地联系起来。

上述解释框架明晰了国家地位、国家角色与国家对外政策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首先,三个变量之间为逻辑递进关系,即国家地位寻求导致国家角色构建,再导致国家对外政策调整;其次,该框架表明国家行为体在实施对外政策时,遵循“从认知到行为”的底层逻辑,并根据旧有信念、预期效用以及新获得的信息来进行判断和决策;最后,该框架还体现出国际体系中主体间互动实践,以及国家行为体与体系环境深度耦合、相互确定属性,并共同演化的动态特点。

^① Sebastian Harnisch, Cornelia Frank and Hanns W. Maull, *Ro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proaches and Analyses*, Routledge, 2012.

国家角色作为中介变量,能更清晰地描述国家从地位寻求到对外政策调整的发生过程。具体来看,有了国家角色构建这一中间环节,一是能充分描述国家在寻求地位时的多维路径以及多重情绪状态。一国在寻求地位时,并非通过单一路径,而是通过构建多种国家角色的多维路径。而国家角色概念不仅可以有效表达国家地位概念中隐含的权利和义务,还可以准确描述出国家在地位寻求过程中的多重情绪状态。譬如,反抗者角色就描述出国家在愤怒或屈辱情绪中的对外攻击性行为。再如,国家在对外决策时往往带有偏好,这体现出国家在对外政策选择排序中的情感成分,而且这种偏好不需要事先的效应认知评估。当国家面临紧急重大事件时,从情绪到决策的通路要比理性选择到决策的通路更短、更快。^①二是能有效说明国家对外行为的“正当性”。国家为了提升自身地位,经常会做出引发争议的对外行为,如进行核试验、军事干预地区冲突、发动宗教战争等。此时,国家经常会援引扮演某些角色如独立者、区域领导者、信仰捍卫者等的必要性,来说明此行为的正当性。

三是能补充说明国家从地位寻求到对外政策调整过程中的国家利益塑造过程。国家拥有改变自身地位的动机后,在调整其对外政策前,先要合理地界定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可由国家角色概念来有效塑造。国家角色能激发国家的意志和行动,并将权力、安全等工具性利益,与形象、声誉等象征性利益有机融合。譬如,国家的生存利益,就可被解释为一种“自我保护者”的角色行为。而且国家角色概念还能消除现实主义偏见,体现国家在寻求利益时的有限理性特征。当一国按照地位目标追求自身利益时,并非完全自私地寻求预期效用最大化,而是要遵守角色规范,并受到信念、尊严、宗教信仰、社会认同等因素的影响,有时甚至做出一些非理性行为。譬如,国家有时会为了尊严和荣誉,牺牲财富或安全。这些均可通过国家角色概念来更好地诠释。总之,国家角色可视为国家的“行动样板”(action template)。它在一定程度上制定了国家对外行为的规范。^②

同时,该解释框架不仅调和了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因素,还坚持国家为有限理性行为体的基本假设,以及国家利益优先于意识形态和普遍道义的价值判断。当国家获得稳定的地位和角色后,其未来对外行为的可预期性也会大大增强。这是因为国家的地位概念及角色概念中有其固有的内在规定性和外在约束性。二者概念中隐含着该

^① James W. Davis and Rose McDermott,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Behavioral I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5, Issue 1, 2021, pp.147-177.

^② Valerie M. Hudson, "Cultural Expectations of One's Own and Other Nations' Foreign Policy Action Templates,"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0, No.4, 1999, pp.767-801.

国的实力、形象、立场,以及核心目标、行为偏好、战略意图等,而这些都会由该国的对外政策及对外行为表达出来。

二 具体解释机制

为剖析上述解释框架,首先,需清晰界定国家地位概念,明确国家寻求地位的动因;其次,阐释国家地位寻求和国家角色构建的内在关联性;最后,分析国家角色定位及角色扮演的动态过程,而该过程也就是国家对外政策的选择及调整过程。

(一) 国家地位的概念及寻求动因

国家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等级体系中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位置,以及他国对本国的价值属性^①排名的集体信念。^② 根据定义,国家地位呈现一种叠加状态,表现为既与物质因素有关,也与观念因素有关。至于哪种因素占据主导,与具体情境相关。^③ 同时,国家地位具有集体性、主观性、稀缺性、社会性等特点。集体性是因为地位超越个体国家的感知,反映出集体信念;主观性是因为地位取决于他国对无形的国家地位属性的感知;稀缺性是因为地位属于稀缺性资源,所有国家不可能拥有同等的地位;社会性是因为地位代表着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一国地位的获得必须取得他国的承认。^④

具体来看,首先,地位是一种“位置性商品”(positional good)。^⑤ 这表明只有当一国在地位阶梯(status ladder)中排名下降时,另一国才能上升。每个国家都有在地位阶梯中争夺更高位置的冲动,即各国都有寻求“地位最大化”(status-maximizing)的动机。其次,地位还是一种“俱乐部商品”(club good)。这是指国家在某个固定群体中的成员资格。^⑥ 例如,“大国俱乐部”成员就是大国地位的体现。俱乐部商品的特性使地位具有非排他性的特点,所以地位竞争也并非完全的零和博弈。但伴随俱乐部成员

^① 这些价值属性主要包括财富、胁迫能力、军事力量、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文化成就、技术革新、社会政治组织和外交影响力等。

^② Deborah Welch Larson, T. V. Paul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Status and World Order,” in T. V. Paul,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eds., *Status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3-30.

^③ 正如同光既具有粒子性,也具有波动性。

^④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Russia Says No: Power, Status, and Emotions in Foreign Policy,”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Vol.47, Issue 3-4, 2014, pp.269-279.

^⑤ Fred Hirsch, *Social Limits to Grow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⑥ Elias Götz, “Status Matters in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3, Issue 1, 2021, pp.228-247.

数量增加,其成员地位的价值也会下降。譬如,“大国俱乐部”的成员越多,成为俱乐部成员的意义就越小。

地位寻求(status seeking)是指国家为维持或提高自身地位而采取的行动。关于国家地位寻求的动机,既有研究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源于人的社会性需求。拉森(Deborah W. Larson)和舍甫琴科(Alexei Shevchenko)认为,人的部分身份来自社会群体的成员身份。自现代国家体系建立和民族主义兴起以来,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国家产生依附感。因此,国家寻求地位的核心驱动力是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对国家尊严和民族自豪感根深蒂固的需求。^① 第二,源于身份类别的社会建构。默里(Michelle Murray)认为,国家寻求地位是为了实现自身身份。她将地位定义为“公认的身份”(recognized identity)。^② 第三,源于对本体性安全的考虑。本体性安全是社会行为体(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形成稳定的自我意识的基本需要。社会行为体在确定他们的物质利益之前,需要对“他们是谁”和他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感到安全。而一国获得的地位会为该国提供按自身利益行事所需的本体性安全。^③ 第四,源于国家对当前地位的不满。伦松(Jonathan Renshon)认为,如果一国认为它有权享有的地位与国际社会赋予自己的地位之间存在不匹配,那么该国就有动机引发国际冲突来改变自身地位。^④

综上,国家寻求地位的根本原因在于地位是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地位不仅可以协助一国在与他国的战略互动中取得优势,还可以提升他国对本国的尊重。较高的国际地位通常意味着拥有更多特权、更大的影响力以及更强的安全感。从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地位与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意义相同。如果A比B的地位高,那么B将倾向于服从A,这与权力关系的表现类似。高地位国家可以更少地依靠武力或胁迫来实现自身目标,并可根据本国利益参与制定全球政治、经济的相关制度或规则。即使实力衰落的大国,若能维持其原有的高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其相对实力下降的影响。从国内因素来看,决策者会通过追求国家地位来提升自己在国内的支持度,而普通民众基于民族自豪感也希望本国地位提升。

^① Deborah W.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Quest for Status: Chinese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p.3.

^② Michelle Murray, *The Struggle for Recogni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atus, Revisionism, and Rising Pow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46.

^③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④ Jonathan Renshon, *Fighting for Status: Hierarchy and Conflict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52-54.

(二) 国家地位寻求导致国家角色构建

国家在寻求地位时,为何会首先构建国家角色呢?这需要对国家地位和国家角色概念的内在关联性进行分析。在社会学理论中,地位和角色是两个截然不同但又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地位是指行为体在一个有组织群体中的相对的社会位置。角色是指行为体根据自身地位而做出的符合预期的适当的行为模式。^①当行为体被分配到社会中的某一个地位,他就拥有这一地位。当他把附属于地位的权利和义务付诸实践时,他就是在扮演着一种角色。^②简言之,行为体在任何社会关系中总有特定的地位,且始终存在与此地位相符的角色。没有无角色的地位,也没有无地位的角色。地位是角色静态、内在的基础,角色是地位动态、外在的表现。根据地位所确定的角色,会有相对应的一套权利、义务、规范和行为模式的要求。

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国际等级体系本质上是基于社会关系建构的,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体自然就有寻求地位的动机。国家地位是指一个国家在国际等级体系中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位置,以及他国对本国的价值属性排名的集体信念。国家角色则是国家根据自身的国家地位而做出的符合预期的适当的行为模式。按照该定义,国家追求什么样的地位,就有什么样的角色要求。对于某种国家地位的追求,会有不同的国家角色与之匹配。

国家地位与国家角色概念的相关联系还在于:第一,二者概念均具有关系性和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特点。关系性意味着二者的定位必须要与外国进行比较;主体间性意味着二者概念必须通过他者的承认才能获得意义和效果。第二,国家的物质能力是支持二者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即国家地位、国家角色都受到该国物质能力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国家也都会寻求与自身物质能力相符的地位或角色。但是二者又不完全由物质能力决定,还会受到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第三,二者概念均超越国家行为体的唯利益性,强调国家行为体的行为源于多重动机的复合,尤其是精神性因素起到重要作用。

国家在确定地位目标后,又是如何来寻求地位并定位角色呢?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中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策略、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策略以及社会创造(social creativity)策略可以对此进行解释。其一,社会流动策略,是

^① Johannes Plagemann and Miriam Prys-Hansen, “‘Responsibility’, Change, and Rising Powers’ Role Conceptions: Comparing Indian Foreign Policy Roles in Glob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and Maritime Secur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20, Issue 2, 2020, pp.275-305.

^② Ralph Linton, *The Study of Man: An Introduction*, Appleton Century Crofts, Inc., 1936, p.113.

指国家会模仿高地位群体的价值观、规则和行为,以求进入高地位群体的俱乐部,但前提是高地位群体的边界是可渗透的。此时的国家角色以合作型角色为主。其二,社会竞争策略,是指当高地位群体的边界不可渗透,无法为一国提供和平提升自身地位的机会,或者当一国认为高地位群体的地位本身不合法或不稳定时,该国将选择竞争策略以求与高地位国家平起平坐,或对其进行超越。此时的国家角色以竞争型角色为主。其三,社会创造策略,是指寻求地位提升的国家会将自身的消极品质重新定义为积极品质,或者选择一个新的评判标准,来使自身更具优势。该策略的运用会导致新的国际规则、规范、制度的建立,或是新的发展模式的产生。此时的国家角色以干涉型角色为主。以上三种策略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通常可以同时使用。^①

另外,国家的地位寻求和角色构建还具有非同步性的特点,可能会出现角色与地位暂时偏离的情况。但无论如何,角色不会偏离太远,都会以地位为基础,围绕其上下波动,并最终趋于一致。当然,若一国的地位目标设定不合理,或者其所扮演的角色与地位不匹配,都会使得该国所追求的客观的国家利益与实际偏离。这将导致该国对外政策要么过于保守要么过于激进,进而引发他国的不满,甚至导致国家间竞争或冲突。

(三)角色期望与角色承认

理论上,国家可以构建与其地位相匹配的任何角色。一国往往会积累角色集(role sets),^②而角色集中的大多数角色都是兼容或互补的。一般情况下,国家会根据地位现状选择扮演一种主要角色,同时扮演几种辅助角色。以南亚大国印度为例。印度主要扮演崛起大国的角色,同时也扮演着南亚区域领导者、不结盟运动倡导者、全球最大民主国家等辅助角色。通常国家实力越强,可以选择扮演的角色就越多。但扮演多重角色也有可能超出国家的实际能力,导致角色期望超载,给国家地位和声誉带来破坏性后果。^③因此,国家需要在不同的角色期望之间做出妥协。

角色期望是指国际、国内观众对国家所扮演的角色的期待与要求。当一国的角色定位和角色期望相一致时,该国可获得国际体系中的稳定角色;而当一国的角色定位和角色期望不一致时,该国容易受到角色冲突的影响。角色冲突是指当国家角色的定位未取得国内共识或是与他者期望不一致,所引起的该国在角色扮演过程中的内外矛盾。它是一种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现象。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一国要么

^① Christina Stolte, *Brazil's Africa Strategy: Role Conception and the Drive for International Status*,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33-34.

^② 角色集是指个人在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地位中所形成的各种角色关系的总和。参见奚从清:《角色论——个人与社会的互动》,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页。

^③ David Blagden, "Britain and the World after Brexit,"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54, No.1, 2017, pp.1-25.

改变自我的角色认知,要么改变他者的角色期望。实际上,角色冲突背后的更深层逻辑是国际、国内观众对该国的地位否认(status denial)。^①这是因为,国家角色是以国家地位为基础建构的,而国际、国内观众对该国的角色期望也主要源于对其地位的认知和判断。所以他们对该国角色的不认可,也就是对该国地位的不承认。

综上所述,一国要想获得稳定的国家角色,就必须获得他者对自我建构的角色的承认。国家角色的承认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主要大国和同侪之国(peer country)的承认是一国获得角色的重要基础;第二,制度和价值观相似的国家更有可能互相承认;第三,对国家角色的承认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一国获得的承认越多,他国就越认为它值得承认。^②根据这些特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赋予另一个国家角色,一国也无法单方面宣称自己获得了某种角色。如果对于某国角色的评判,其他任一国家的判定结果都不一样,那么该国就根本没有获得此角色。简言之,国家角色的获得需要众多他者的共有认知。这里的共有认知绝不是个体认知的简单叠加,而是经由主体间互动、聚合生成的一种能超越个体认知的观念产物。^③

通常情况下,一国的决策者和政治精英会根据本国所寻求的地位,研究本国潜在角色的范围,分析每种角色定位可能带来的成本和收益,并尝试以最低成本的方式向外投射出预想的角色。一国的角色定位原则上会体现出该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及主要承诺,他国也会根据该国的角色定位来推断其在国际事务中的目的、立场及行为。

(四) 角色扮演与对外政策调整

国家在角色定位后,会进行角色扮演。角色扮演是指国家按照角色规范,履行自身角色所蕴含的权利和义务的行为。国家的角色扮演过程,也就是国家的对外政策选择及调整的过程。这个过程可通过信号传递机制来描述。这里所说的信号是指,国家为了试图塑造、维系或改变自我在国际体系中的国家角色,而对国际观众和国内观众做出的声明或行动。^④这些声明或行动又由信号的发出者和接收者赋予其意义。国家为了塑造自身角色而发出的信号具有多种表达形式,如外交话语、官方声明、领导人讲话、战略选择、军事行动,以及一些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特殊行为——研制核武器、建

^① Steven Ward, "Status, Stratified Rights, and Accommodat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ournal of Global Security Studies*, Vol.5, Issue 1, 2020, pp.160-178.

^② Allan Dafoe, Jonathan Renshon and Paul Huth, "Reputation and Status as Motives for War,"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7, 2014, pp.371-393.

^③ 这是因为,当一组相互关联的单位或成员组成系统后,整个系统显现出来的特征和行为方式会不同于系统各个部分所显现出来的特征和行为方式,即行为的整体结果不等于诸多单个行动的机械相加。参见[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④ [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徐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页。

造航空母舰、建设太空项目、举办奥运会等。^① 这些信号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信息传递,重在影响国际、国内观众的短期感知。当这些短期感知经过长期积累,会使国际、国内观众逐渐形成对一国的角色认知。

国家角色扮演中的信号传递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一国通过角色实践向外释放相关信号,然后由国际观众和国内观众接收信号,并捕捉、识别其中的可靠信息,再做出反应和判断。在此过程中,国家作为信号发出者,会预判接收者的反应,以期更好地展示良性意图;而国际、国内观众作为信号接收者,会检验信号的可信度,然后综合自身对该国的角色认知做出反馈,即表达对该国的角色期望。

国家在发出信号时,有时会采取有偏向性的话语或行动,并倾向于夸大自身优势,掩盖自身劣势,这使得信号承载的信息并不完全准确。同时,在缺乏强制执行力的情况下,信号也不能确保国家会依照此信号来行事。这里就涉及信号的可信性问题。信号的发射强度,信号是否昂贵,^②传输渠道是否通畅,信号发出者是否具有欺骗意图,信号接收者的认知预期等因素,都会影响到信号的可信性。那些通过信号表现出对某一角色的承诺,但实际却缺乏扮演该角色的能力的国家,很可能会受到国际、国内观众的质疑。若一国在某件事上不兑现角色承诺,就将破坏它后续发出的类似信号的可信性,最终它将无法构建起稳定的国家角色,进而也会影响其地位追求。当然,国家为强化所发出信号的可信性,可以采取沉没成本(sinking costs)策略——事前代价高昂的行动或者自缚手脚(tying hands)策略——事后代价高昂的行动。^③

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国家有时会故意发出模糊的信号,来试探国际、国内观众对其扮演角色的真实想法。如果他们对该国试图扮演的角色持有反对意见,则该国可能会重新定位角色,再发出一个调整后更为明确的信号。这就使得国家具有一定的缓冲空间,更容易针对本国角色进行“讨价还价”,并有利于保持自身的形象与声望。^④ 但这又要求国家必须有足够的手段,让发出的信号模糊到在必要时可以否认其曾经发出过,又要清晰到足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同时,国家也有动机向不同的观众

^① 参见 David Jinkins,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127, 2016, pp.115-132.

^② 基于成本高低可将信号分为昂贵信号及廉价信号。昂贵信号由于成本高,所以其可信性更大。比如,军事动员相对来说就是一种昂贵的信号,而外交话语相对来说就是一种廉价的信号。

^③ 例如,支付防御部队中的士兵的工资体现出“沉没成本”策略。因为无论敌方袭击是否发生,在事前都必须进行该项支出。而联盟承诺则体现出“自缚手脚”策略。因为联盟承诺的事前成本很低,仅是一纸契约。只有在未来当挑战出现时,捍卫联盟承诺才产生大量成本。参见 James D.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 No.1, 1997, pp.68-90.

^④ Floyd H. Allport, *Theories of Perception and the Concept of Structure: A Review and Critical Analysis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a Dynamic-Structural Theory of Behavior*, Wiley, 1955, p.382.

释放不同的信号,并按照自身意愿选择是公开发出还是私下发出。但仅针对某类观众释放信号非常困难,大量信号还是会被多重观众所接收并解读。^①因此,一国在释放信号前,或者说在进行角色实践前,必须反复斟酌。

国际、国内观众在接收信号后,会进行信号甄别,并做出相关推断。其一,该国投射的角色形象与过去该国扮演的角色形象有何异同;其二,该信号是否能准确预测发信号者未来的角色行为。国际、国内观众对信号准确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信号发出国诚实度的判断,这样就增加了信号发出国诚实度名声的价值。虽然一国可以不按照信号的方式来行事,或者说不按照其投射出的角色形象来进行对外行为,但成本是别国在未来就不再那么信任它了。^②另外,由于国际、国内观众处理信号的能力有限,再加上他们先入为主的错误知觉和主观偏见,信号很容易被错误解读。比如,一国旨在提高自身威望的角色行为,如军事演习、军事干预等,可能会被解读为发出侵略意图的信号。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对外政策变化也会对该国的角色构建、地位伸张产生一定的反向影响。其一,一国的角色扮演(实行对外政策)会反作用于该国进行地位寻求和角色构建的体系环境。譬如,当面对本国的角色扮演时,他国的反应及反馈过程,也可视为一个角色扮演过程,而他国所扮演的角色则是一种相称角色(commensurate role)。^③由此,自我(self)和他者(other)根据各自的角色定位进行角色实践,塑造着国际体系的互动结构。^④而这种无处不在的角色互动和关系过程,持续影响着国际体系环境。

其二,一国在角色扮演过程中,还面临着观众成本问题。当一国进行角色扮演时,其角色概念与角色行为之间常常会产生分歧,即所谓“概念—表现差距”(conception-performance gap)。^⑤而国家扮演的角色越复杂,国际、国内观众越多样化,则该国的角色表现和观众期望之间的差距可能就越大。当一国无法履行所做出的角色承诺,或其自我角色认知与国际、国内观众对其的角色期望不符时,国际观众可能通过拒绝承认、中断对话、经济制裁、武力威慑等方式,国内观众可能通过对决策者进行批评、谴责、解

① 蒲晓宇:《地位信号、多重观众与中国外交再定位》,载《外交评论》,2014年第2期,第25-38页。

② [美]罗伯特·杰维斯:《信号与欺骗:国际关系中的形象逻辑》,第55-63页,第132页。

③ Sebastian Harnisch, "Conceptualizing in the Minefield: 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Learning,"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Vol.8, Issue 1, 2012, pp.47-69.

④ Shogo Suzuki, "The Importance of 'Othering' in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s a Stage of Identity Conflicts," *The Pacific Review*, Vol.20, Issue 1, 2007, pp.23-47.

⑤ Ole Elgström and Michael Smith, *The European Union's Rol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ncepts and Analysis*, Routledge, 2006, p.248.

除职务、罢免等方式,对该国进行施压或惩罚。比如,一个声称不结盟的国家,倘若突然与某个大国结盟,可能会立刻受到其他大国的压力,从而不得不放弃扮演大国盟友的角色。再如,一国决策者为本国设定的国家角色若始终无法在国内观众中引起共鸣,会导致国内选民对其支持率的大幅下降。总之,观众成本问题会引发该国的角色内冲突或角色间冲突,迫使该国改变地位目标,重新定位国家角色,进而改变角色行为。

对于一国所寻求的地位与角色是否最终获得承认,可通过一些标志性事件来衡量。例如主办国际首脑会议、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成为重要国际组织成员、参与全球治理及多边论坛、参与协调国际危机或冲突、举办大型国际体育或文化活动、收到大量投资或发展援助资金等。

以上阐释了本研究解释框架的作用机理及传导机制,下面采用此框架来分析英国脱欧后的对外政策及对外行为。之所以选择脱欧后的英国为案例,主要因为大国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要行为体,是塑造国际体系结构和进程的主要参与者。因此,研究大国的地位寻求、角色构建和对外政策变化具有重要意义。脱欧后的英国物质能力相对有限,却又有着寻求全球性大国地位的野心,并且它正处于调整国家角色的进程之中。

三 脱欧后英国的对外政策及对外行为

国家的地位寻求是其对外行为的动机。地位相对静态,角色相对动态,所以国家地位容易界定,而国家角色却不易界定。对英国来说,脱欧后它不满足于做一个区域性大国,而是谋求成为全球性大国。在寻求地位的过程中,英国试图扮演美国忠实盟友、欧盟区域伙伴、全球贸易大国、“盎格鲁圈”(Anglosphere)协调者、英联邦领导者、民主价值观维护者等角色,从而引发其对外政策一系列的变化。但英国试图扮演的诸多角色,有些互不兼容,有些则与国际、国内观众对它的角色期望不一致。这导致了英国在角色实践过程中的角色冲突,并造成其对外政策的不连贯性及不确定性。

(一) 地位寻求

英国追求全球性大国地位是基于其辉煌的历史。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全球霸主,整个欧洲的天平都随着它的意愿而倾斜。到20世纪30年代,4200万英国人统治着约5亿外国臣民。^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地位大为削弱。旧有帝国的丧失,美

^① Piers Brend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1781-1997*, Jonathan Cape, 2007.

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以及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英国两次申请加入均被拒绝),动摇了英国对其国家地位的自信。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清楚地表明,英国已无力继续维持其全球性大国地位。到1968年,在国际支付危机和殖民体系瓦解的双重压力下,英国不得不宣布从波斯湾和远东撤军,并从大国俱乐部中黯然退场。

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英国对外政策开始变得强硬,国际地位也明显提升。撒切尔在执政期间实行铁腕政策,果断地减少政府干预,积极地推行货币主义政策,并坚决地打赢了马岛战争。撒切尔政府还利用东西方关系从紧张转向缓和与美苏调整政策的时机,在东西方关系中扮演起某种调解者的角色,发挥了超出英国实力的影响和作用。^①但即便如此,撒切尔仍谨慎地将英国定位为“中等强国”(middle-ranking power)。^②冷战的终结则使英国又一次面临地位危机。这是因为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使英国保持其全球地位的重要支柱——对西方安全防务的贡献——的根基被摧毁。

其后,英国对于自身的全球地位一直很敏感。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执政,英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恢复自身全球性大国的地位。当然,英国目前仍拥有许多资源使其保持这种野心。譬如,它是拥有广泛军事资源的核大国,拥有全球第二大海外军事基地网,用于维护国际秩序的军队规模在全球仅次于美国。^③它的武装部队依然强大,是“全球少数几个能够在距离国家海岸线7000英里以外的地方部署空中力量的国家之一”。^④英国还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第三大对外援助国,拥有14块海外领地,并与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外交关系。同时,它还拥有发达的金融业、雄厚的科技资本、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以及底蕴深厚的外交传统和影响深远的法律体系。另外,与许多发达国家不同,英国的人口较为年轻,而且仍在持续增长。据联合国《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报告预测,到2084年,英国人口将达到7136万,届时将超越德国,成为欧洲人口第一大国。^⑤另外,十分重要的是,英国国内的政治精英和普通民众亦存在一种共识,那就是英国拥有影响和塑造国际社会的强大能力。

2010年,英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英国必须

① 王振华:《“撒切尔主义”的终结》,《人民日报》,1991年1月3日,第6版。

② Margaret Thatcher, *The Downing Street Years*, HarperCollins, 1993, p.9.

③ Justin Morris, “How Great Is Britain? Power, Responsibility and Britain’s Future Global Role,”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3, Issue 3, 2011, pp.326-347.

④ The UK Government, “Foreign Secretary’s Speech at Raisina Dialogue, New Delhi,” January 18, 2017.

⑤ United Nations,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22,” <https://population.un.org/wpp/Download/Standard/Population/>.

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强大的角色,以快速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国际军事冲突等全球性挑战。^① 2015年,英国再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保护人民、促进经济繁荣、向全球投射影响力作为国家安全的主要目标,并指出完成这些目标的重要条件是推动全球法治、善治以及民主的增长。^② 两份报告彰显出英国在全球推广自身影响力和价值观的盘算,以及追求全球性大国地位的筹谋。

2021年3月16日,英国发布《竞争时代的全球英国——安全、国防、发展与外交政策的综合评估》报告(以下简称《综合评估》)。这是冷战后英国发布的最全面的战略与安全报告。《综合评估》声称,英国作为“民主灯塔”,将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继续强化在国家安全及防务领域(特别是空间、网络和人工智能)的竞争优势,持续提高战术效力和战略自我意识。它还宣称,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重心正日益转向印太地区,英国外交政策将会向该地区“倾斜”。同时,英国也会以建设软实力超级大国为目标,进一步加强自身作为全球数字及数据枢纽的地位。另外,作为全球正义的力量,英国还将捍卫开放、民主和人权,并继续在集体安全、多边治理、冲突解决、供应链安全、应对气候变化和健康风险等方面发挥国际主导作用。^③ 总之,《综合评估》再一次表明,英国正将追求全球性大国地位作为其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

(二)角色构建与角色行为

脱欧前,英国借助英美特殊关系和欧盟成员国身份,保持国家地位的相对稳定。脱欧后,英国追求全球性大国地位,匹配相应的国家角色,并主要扮演着美国忠实盟友、欧盟区域伙伴、全球贸易大国、“盎格鲁圈”协调者、英联邦领导者、民主价值观维护者六种角色。这些角色决定着当前英国对外政策及对外行为的特点。

下面通过内容分析法对上述英国国家角色的假设加以验证。内容分析是通过客观、系统地识别文本内容的特征和性质,来判断趋势效果及差异。首先查找特定文本材料中与英国国家角色相关的词语,其次进行词频统计以及词语关联度分析。文本材料包括英国国际贸易部、国防部、外交及联邦事务部、国会情报安全委员会的年度工作报告、首相就职演讲以及英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官方文件。文本材料选取的时间段为2016年至2021年,^④横跨特雷莎·梅至鲍里斯·约翰逊两届政府,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① The UK Government, “A Strong Britain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18, 2010.

^② The UK Government,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Strategic Defence and Security Review 2015,” November 23, 2015.

^③ The UK Government, “Global Britain in a Competitive Age: The Integrated Review of Security, Defence,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Policy,” March 16, 2021.

^④ 其中《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2012年开始统计。

表 1 英国国家角色相关词语词频统计

序号	英文词语	中文释义	词频统计 (单位:个)	占比 (单位:%)
1	security	安全	3273	68.40
2	challenges	挑战	3194	66.74
3	cooperation	合作	2920	61.02
4	values	价值观	1858	38.83
5	cyber	网络的	1751	36.59
6	international	国际的	1673	34.96
7	commonwealth	英联邦	1085	22.67
8	allies	盟国	1075	22.46
9	Europe	欧洲	977	20.42
10	partners	合作伙伴	929	19.41
11	threat	威胁	920	19.23
12	trade	贸易	739	15.44
13	role	角色	634	13.25
14	NATO	北约	503	10.51
15	network	网络	453	9.47
16	power	权力	208	4.35
17	union	联盟	192	4.01
18	democracy	民主	170	3.55
19	America	美国	111	2.32
20	status	地位	56	1.17

注:表由作者自制。此处使用 R 软件对文本内容进行词频统计以及词语关联度分析。在统计时,词语若出现单复数形式或不同时态等,均将其整合为同一类名词。经筛选,得到以上 20 个与英国国家角色相关的关键词。表中最后一列表示关键词占总词汇的万分比,总词汇是将文本内容清理后得到的词汇总数。

然后,查询以上关键词与哪些词语关联度最高,并列示与其最相关的前四个词语,结果如表 2 所示。词语关联度由左向右依次降低,即关联词语 1 与关键词相关程度最高,关联词语 4 与关键词相关程度最低。

表2 与关键词关联度最高词语统计

序号	关键词	关联词语 1	关联词语 2	关联词语 3	关联词语 4
1	安全	本土	情报	威胁	网络
2	挑战	脱欧	伙伴关系	军事	北约
3	合作	法国	安全	脱欧	协作
4	价值观	公平	市场	现实的	民主
5	网络的	攻击	恶意的	安全	防御
6	国际的	秩序	基于规则的	共存	伙伴
7	英联邦	每年的	委员会	学术	独特的
8	盟国	伙伴	北约	逐步演化的	统一
9	欧洲	联盟	邻居	合作	跨大西洋主义
10	合作伙伴	东盟	印太	可信的	英美关系
11	威胁	安全	激增	极端主义	非国家
12	贸易	自由的	世界贸易组织	CPTPP	对话
13	角色	扮演	领导者	辅助	转换
14	北约	联盟	峰会	威慑	欧洲—大西洋
15	网络	全球	海外	政府的	外交
16	权力	软的	授权	改革	基于规则的
17	联盟	欧洲	成员	明确表达的	代表
18	民主	反虚假信息	制裁	规则	选民
19	美国	拉丁美洲	降级	自由贸易协定	加拿大
20	地位	忽略	维持现状的	有争议的	失败

注:表由作者自制。表内“CPTPP”全称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由表1和表2的结果可知,脱欧后英国尤其重视国家安全,以及与美国和欧盟的伙伴关系建设。同时,英国崇尚全球自由贸易,倡导民主价值观,并认为自身面临巨大挑战,因而积极拉拢英联邦国家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由此,实证结果基本验证了上文所假设的英国六种国家角色。另外,该假设还可从英国国内民众对英国的国家角色期望得到证明。譬如,2019年英国外交政策组(BFPG)公布的一份民调报告显示,英国民众最看重的英国全球角色,按照投票比例排名前五位依次是:将国内民众利益和福祉放在首位的国家(49%)、解决全球政治问题的领导者

(40%)、自由贸易推动者(35%)、英联邦领导者(31%)、欧盟中的主导国(24%)。^①2022年,BFPG公布的另一份民调报告则显示,英国民众认为英国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措施(38%)、加入AUKUS(37%)、“保卫”乌克兰对抗俄罗斯(37%)最有利于英国全球声誉的提升。^②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脱欧前也曾以不同程度扮演着这六种角色。但自1973年加入欧共体至2016年全民公投脱欧的40多年时间里,英国的主导国家角色是欧盟核心成员,这使其更多时候表现为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欧洲大国。虽然英国曾屡次试图彰显其全球性大国地位,但其对外行为始终受制于欧盟成员的身份。简言之,在欧盟的框架约束下,英国始终无法完全对以上角色进行扮演,而且有的角色也仅作为辅助或从属角色。脱欧则意味着英国放弃欧盟成员的主导角色,而以上限制条件也就不复存在。这再次燃起它追求全球性大国地位的斗志。英国利用重新获得的自主权,对国家角色进行调整及重构。另外,一国在角色扮演过程中,会结合角色实践的具体情境,不断地调整角色行为,即进行角色适应(role adaption);有时还会产生关于该角色的新观念或新认知,即进行角色学习(role learning)。^③这说明即便是同种国家角色,也会在不同情境下产生不同的内涵。譬如,英国在脱欧前就扮演着全球贸易大国的角色,但彼时该角色的行为要受制于欧盟的贸易规则;而脱欧后,英国可以自主地决定贸易政策,而该角色的行为特点也随之发生变化。

总之,脱欧后,英国摆脱欧盟的规则束缚,专注自身比较优势,在各大国之间折冲樽俎,更自由地参与国际事务。它不仅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强化与英联邦及“盎格鲁圈”国家的联系,还利用强大的软实力有效整合资源,提高全球竞争力。但同时,英国也面临政治撕裂、财政紧张、外交资源有限以及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等难题。这些因素影响着英国国家角色的行为脚本,推动英国不断进行角色的构建、权衡及再定位——包括其先赋角色(ascribed role)的调整,也包括其自致角色(achieved role)的塑造,^④并最终导向上述六种角色。在此过程中,英国持续向国际、国内观众释放多种

^① British Foreign Policy Group, “Behind Global Britain: Public Opinion on the UK’s Role in the World,” April 2019.

^② British Foreign Policy Group, “Annual Survey of UK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Britain,” June 2022. “AUKUS”是指“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③ Sebastian Harnisch, Cornelia Frank and Hanns W. Maull, *Role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pproaches and Analyses*, Routledge, 2011, p.253.

^④ 先赋角色指行为体因先天因素获得的角色,自致角色指行为体因努力和开展的活动获得的角色。参见 Philippe G. Le Prester, “Author! Author! Defining Foreign Policy Roles After the Cold War,” in Philippe G. Le Prester, ed., *Role Quest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Foreign Policies in Transiti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14.

信号。

第一,美国忠实盟友。英国扮演该角色既是历史的惯性,也是现实的需要。二战后,英国曾成功地将美国的力量与自身的偏好相结合,得以在自身实力严重削弱的情况下,继续享有较高的国际地位。冷战期间,英国亦巧妙地协调大西洋两岸事务,成为欧洲和美国之间的“桥梁”。

冷战结束后,英国继续唯美国马首是瞻,始终坚持英美特殊关系的优先性。除鼎力支持美国发动的2001年阿富汗战争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外,英国还与美国在反恐、情报分享、北约防务、网络安全等领域通力合作。因此,它也被形象地称为美国的“第51个州”“永不沉没的航母”。^①2021年6月10日,英美签署《新大西洋宪章》,意图借用80年前二战期间《大西洋宪章》的遗产,继续联手引领西方世界。^②

脱欧后,为进一步巩固该角色,英国通过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来传递信号。2021年5月,英国派遣“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到印太地区巡航,开展所谓捍卫“航行自由”的行动,后又宣称将在印太海域永久性部署两艘军舰。在中美战略竞争大背景下,英国还在对华政策上逐渐和美国趋同,自愿充当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它不仅鼓动西方国家联合起来抵制中国高科技,还曲解《中英联合声明》以染指中国香港事务,甚至诬蔑新疆存在“反人类罪行”,鼓噪中国崛起对“自由国际秩序”的严重威胁。

实际上,英国扮演该角色的真正意图是搭乘美国自由霸权秩序的“便车”来提升自身全球地位。虽然它被视为美国联盟建设和联盟行动的天然伙伴,但双方关系也并非“铁板一块”。譬如,在北爱尔兰和平问题上双方就存在严重分歧。2021年3月16日,15名美国参议员联合提出一项针对北爱尔兰和平问题的决议,要求英国政府全面执行《贝尔法斯特协议》和《北爱尔兰议定书》,否则将反对未来英美签订的任何自由贸易协定。^③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丝毫不顾及英国的感受,更凸显两国关系的非对称性。同时,很多英国民众认为该角色使本国成为美国的附庸,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战略自主权和外交灵活性。2022年BFPG的一份民调报告显示,50%的英国民众认为美国政治的不稳定性削弱了英美联盟,55%的英国民众认为美国脆弱的

^① Andrew Gamble, “The Anglo-American Special Relationship,” *British Politics Review*, Vol. 3, No. 4, 2008, p.5, https://www.duo.uio.no/bitstream/handle/10852/68532/1/British-Politics-Review-04_2008.pdf.

^② The White House, “The New Atlantic Charter,” June 10,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6/10/the-new-atlantic-charter/>.

^③ The US Senat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Menendez, Collins, Colleagues Introduce Resolution Reaffirming Bipartisan Support for 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 March 16, 2021.

民主和社会制度将迫使其在不久的将来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国内。^①

第二,欧盟区域伙伴。脱欧前,英国曾明确表示,脱欧后它将继续致力于与欧盟在安全、司法、外交、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密切合作。英国扮演该角色,主要是因为其全球地位的提升离不开欧洲伙伴的支持,更何况其对外贸易早已与欧盟市场高度融合。2020年12月30日,在脱欧过渡期结束前最后一刻,英欧签署了《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根据协定,双方继续享受对方给予的零关税、零配额的贸易待遇。^② 2021年,英国42%的出口流向欧盟,45%的进口来自欧盟,与欧盟的贸易逆差高达320亿英镑。^③

欧盟也相对欢迎英国扮演该角色,因为欧洲的安全和防务离不开英国的支持。目前,英国仍拥有欧洲最强的军事力量以及最高的军事开支。脱欧前,英国防务支出占欧盟总体防务支出的25%,军队人数则占10%,^④而且英国情报机构还一直领导着欧盟内部情报事务。欧盟最重要的共享情报中约有40%至50%来自英国机构。^⑤

2022年2月24日,乌克兰危机爆发,引发欧洲冷战后最严重的安全危机。欧洲各国对俄罗斯的戒备迅速上升。德国旋即表示将追加1000亿欧元用于军备建设,且今后每年军费开支增加到GDP的2%。^⑥ 芬兰、瑞典等长期奉行不结盟原则的欧洲国家也纷纷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和战略物资,并正式申请加入北约。若二者成功加入,北约与俄罗斯的边界长度将增加一倍。^⑦ 冲突不仅带来粮食危机和能源危机,还引发了难民潮。据联合国难民署估计,截至2022年7月末,约615万人因战争逃离乌克兰,另有约992万人在乌境内流离失所。^⑧ 此外,这场危机也对俄乌两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数据预测,2022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经济将分

① British Foreign Policy Group, "Annual Survey of UK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Britain," June 2022.

② 王展鹏主编:《英国发展报告(2020-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

③ Ilze Jozepa, "Trade: Key Economic Indicators," UK Parliament, July 13, 2022, <https://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research-briefings/sn02815/>.

④ Amelia Hadfield and Nicholas Wright, "Fog in Channel? The Impact of Brexit on EU and UK Foreign Affairs," June 11, 2021, https://www.iss.europa.eu/content/fog-channel-impact-brexiteu-and-uk-foreign-affairs#_introduction.

⑤ Anthony Glees, "What Brexit Means for British and European Intelligence Agencies," *Journal of Intelligence History*, Vol.16, Issue 2, 2017, pp.70-75.

⑥ Mathew Burrows and Robert A. Manning, "How Will the Russia-Ukraine War Reshape the World? Here Are Four Possible Futures," Atlantic Council,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content-series/the-big-story/how-will-the-russia-ukraine-war-reshape-the-world-here-are-four-possible-futures/>.

⑦ The UK Government, "PM Statement on the Commonwealth, G7 and NATO Summits," July 4, 2022.

⑧ UNHCR, <https://data.unhcr.org/en/situations/ukraine>.

别萎缩 10% 和 30%。^①

乌克兰危机致使英欧面临共同安全威胁,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因英国脱欧给双方带来的紧张关系。英欧联合美国争先恐后地对乌克兰进行军事及资金援助,并对俄罗斯展开严厉制裁。伴随局势不断恶化,双方始终在外交协调、情报共享和制裁方案执行方面保持高度一致。而英国也借机持续释放信号,证明英欧之间仍存在巨大的战略合作潜力。

但是,英国与欧盟的离心离德又使得该角色的建构颇为困难。脱欧前,英国一直扮演着欧盟内部的“尴尬伙伴”(awkward partner)的角色。这种角色描绘出一种边缘性的状态——一方努力与另一方融合,但却对后者的目标和战略缺乏充分的归属感。^② 英国对欧盟半心半意的态度还深深植根于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中隐含的联邦制的本能厌恶。英国偏好政府间主义,始终希望欧盟只是松散的政府间组织。一直以来,它都未加入欧元区 and 《申根协定》。同样地,欧盟对英国也一直抱持将信将疑的态度。英国所尊崇的普通法及新自由主义经济,与欧盟主流的法律制度及经济政策格格不入。欧盟还指责英国总是将英美关系置于英欧关系之上,它就像是美国安插在欧盟内部的“特洛伊木马”。^③ 目前,由英国脱欧引发的英法捕鱼权争端、英欧金融服务贸易安排、北爱尔兰贸易地位、苏格兰再次独立公投等问题,仍使得双方关系龃龉不断。

第三,全球贸易大国。英国是依靠贸易立国和商业立国的典型国家。脱欧使得英国在 40 多年来可以第一次完全独立地制定对外贸易政策。这是英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外向”并拥有“作为世界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最有力的倡导者”的机会。^④ 2016 年 9 月,时任首相特雷莎·梅在参加 G20 峰会前公开表示,英国在脱欧后将成为自由贸易的全球领袖,并作为一个大胆、自信、外向的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关键作用。^⑤

2021 年,英国对外贸易开始从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创中复苏,出口总额达 6250 亿英镑,同比增长 8.9%;进口总额达 6540 亿英镑,同比增长 11.6%,而且依然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领域保持明显优势。^⑥ 借助这股强劲复苏的东风,同年 11 月,英国国际

^① Aaron Eglitis, “Ukraine’s Economy to Shrink 30% This Year Due to War, EBRD Says,” BNN Bloomberg, May 10, 2022.

^② Philomena Murray, Alex Warleigh-Lack and Baogang He, “Awkward States and Regional Organisations: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ustralia Compared,”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Vol.12, Issue 3, 2014, pp.279-300.

^③ Samuel Stolton, “UK Will Become ‘Trojan Horse’ inside EU, British MP Threatens,” Euractiv, April 10, 2019, <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uk-europe/news/uk-will-become-trojan-horse-inside-eu-british-mp-threatens/>.

^④ The UK Government, “Davos 2017: Prime Minister’s Speech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January 19, 2017.

^⑤ “Theresa May: UK Will Be ‘Global Leader in Free Trade’,” *BBC News*, September 3, 2016.

^⑥ Ilze Jozepa, “Trade: Key Economic Indicators,” UK Parliament, July 13, 2022, <https://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research-briefings/sn02815/>.

贸易部提出“英国制造、销往世界”的新口号,声称到 2030 年要将出口额提高到 1 万亿英镑,以进一步释放本国出口潜能。^① 另外,英国还计划到 2022 年底与覆盖自身 80% 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成自贸协定。

在美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增强的当下,无疑是英国谋求此角色的最好时机。对此,英国释放出两个强烈信号:一是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二是建立与东盟的对话伙伴关系。英国于 2021 年 2 月 1 日申请加入 CPTPP,于 9 月 28 日首次与 CPTPP 工作组谈判,并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该协定的非创始成员国。英国加入的目的,首先是分享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红利;其次是充分利用 CPTPP 成员国在发展水平、工资收入和资源禀赋方面的不同结构,来建立高效的供应链网络。而为了更好地促进贸易发展,英国还用尽浑身解数拉拢东盟。英国不仅是全球为数不多的在东盟每一成员国中都设有大使馆或高级专员公署的国家,而且是对东盟投资最多的欧洲国家。^② 2021 年 8 月 5 日,英国与东盟正式建立对话伙伴关系。这也是东盟过去 25 年来第一次接纳新的对话伙伴。英国的主要目的是为双方营造一个贸易量增加、供应链安全、跨境投资扩大的良好环境,并为本国企业在这个拥有 6.6 亿人口的高增长地区寻找机会。^③

然而,英国对该角色的扮演却面临重重阻碍。首先,英国贸易规模相对较小。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2021 年,全球贸易总额高达 28.5 万亿美元,而英国贸易总额仅占其中的 4.1%,约为中国贸易总额的五分之一、美国贸易总额的四分之一。^④ 其次,英国意图通过与全球其他地区的贸易增长来对冲脱欧带来的贸易损失的做法过于理想化。因为无论是商品贸易还是服务贸易,地理距离仍然是国际贸易达成的主要决定因素,而其他地区都不具备欧盟地理紧邻英国的优势条件。^⑤ 最后,英国需要分别与他国重签自贸协议,这是一项短期内无法完成的艰巨任务。譬如,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直言,英国脱欧后与加拿大进行的贸易谈判,将不会是“容易的或自动形成的”。加拿大和欧盟签署的同类贸易协议——《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CE-

① The UK Government, “Made in the UK, Sold to the World: New Strategy to Boost Exports to £1 Trillion,” November 16, 2021.

② The UK Government, “Foreign Secretary Hunt: Britain’s Role in a Post-Brexit World,” January 2, 2019.

③ The UK Government, “UK Becomes Dialogue Partner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ugust 5, 2021.

④ UNCTAD,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wds/ReportFolders/reportFolders.aspx?sCS_ChosenLang=en.

⑤ Kai Oppermann, Ryan Beasley and Juliet Kaarbo, “British Foreign Policy after Brexit: Losing Europe and Finding a Rol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4, Issue 2, 2020, pp.133-156.

TA),耗时近10年才完成。^①而英美自贸协议也遭遇搁浅。其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劳工阶层强烈反对该协议,英国又不愿开放农业、食品标准及医药卫生等领域,并且双方还在政府补贴、监管标准、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分歧。^②

第四,“盎格鲁圈”协调者。“盎格鲁圈”国家拥有相同的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共享历史、法律和民主传统。它们均与英国同宗同源,并拥有着庞大的经济规模。2021年,“盎格鲁圈”核心五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③——的GDP之和占全球GDP的31.2%。^④如果英国该角色设定获得认可,那它可以更好地调动“盎格鲁圈”资源,这对提升自身国际地位十分有利。

英国首先通过强化自身在“五眼联盟”(Five Eyes)中的协调作用来发出信号。“五眼联盟”正是由“盎格鲁圈”核心五国组成。它始于1946年3月5日英美签署的《英美防卫协议》,是全球最大、最成功的情报机构。在联盟内部,美国是领导者,英国是协调者,加澳新三国则依赖英美的专业知识、监察指导和军事援助。英国不仅利用“五眼联盟”来强化国际声誉,加强网络安全建设,打击有组织犯罪,还充分发挥协调作用,积极拉日本“入伙”,以求进一步增强联盟实力。^⑤

英国发出的另一个信号是强化英加澳新共同体(CANZUK)的深度融合。英国不仅协调四国深化军事交流合作,签署防务互助协议,还力促商品、服务、资本、人员在共同体内部的自由流动,并推动共建大使馆联合体等。英国意图引领CANZUK成为与中美欧并肩的世界经济强国集团,甚至发展成为具有实体性质的邦联,而它作为主导国也必将获得最大收益。

英国还通过加强其在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中的协调作用来塑造形象。AUKUS成立于2021年9月15日,其首项倡议是三国合作为澳大利亚开发未来的核动力潜艇。三国声称,AUKUS将致力于促进与国防相关的科技、工业基地和供应链的整合,并深度介入印太地区,保护在该地区的共同利益。在AUKUS的战略安排中,美国是主导者,澳大利亚是受益者,英国则又扮演着协调者的角色。通过该机制,英国进一步提升与美澳之间的特殊信任与合作水平,并与其联合起来进行科技军工复

^① David Ljunggren and Andrea Hopkins, “Canada PM Trudeau Wants Britain to Stay in European Union,” Reuters, May 20, 2016,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canada-trudeau-brexite-idUKKCN0YA2YQ>.

^② Heather Stewart, “Britain’s Hopes of Early Post-Brexit Trade Deal with US Appear Dashed,” *The Guardian*, September 21, 2021.

^③ 狭义上看,“盎格鲁圈”仅指这五国,但广义上看,“盎格鲁圈”是以五国为核心,再加上一系列外围讲英语的国家,如爱尔兰、印度、南非、尼日利亚等。这里采用狭义概念。

^④ World Bank,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data/download/GDP.pdf>.

^⑤ “UK Welcomes Prospect of Japan Joining ‘Five Eyes’ Intel Nations,” ARAB News, September 16, 2020, https://www.arabnews.jp/en/japan/article_26740/.

合体的全面整合,共建海上民主国家集团。

“盎格鲁圈”国家虽依赖历史、血缘及语言保持紧密联系,但实际上,五国的战略重心各不相同。在现实利益冲击下,它们往往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更重要的是,“圈内”加澳新三国主要依赖的是美国,对于它们而言,英国的“协调作用”仅具有表面象征意义,实际用处并不大。另外,英国的这一角色不仅暗含着一种种族优越感,还体现出“小圈子”思想。这不仅背离英国所宣扬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也与全球多边主义进程相违背。

第五,英联邦领导者。英联邦由 56 个国家组成,^①代表着全球 25 亿人口,虽然成员之间关系松散,但影响力不可小觑。譬如,英联邦整体经济规模庞大。从 2017 年迄今,英联邦 GDP 增长了四分之一,预计未来五年将再增长 50%,达到 19.5 万亿美元。而且成员间拥有共同体附带的各种成本优势,使得它们之间的贸易成本比全球平均贸易成本低 20%。^②自 1971 年始,英联邦国家每两年便举行一次政府首脑会议。脱欧前,英国就高调宣称要使英联邦“回到英国外交政策的核心”。^③脱欧后,为进一步主导英联邦的议程设置与发展方向,英国不惜投入大量资金援助成员国。2018 年至 2020 年,英国专门为英联邦公民提供 5 亿英镑的资金,用于解决传染病防治、女性教育、海洋治理、网络安全等问题。^④

为进一步塑造好该角色,英国首先通过强化与英联邦的贸易关系来发出信号。在其鼓动下,2018 年 4 月英联邦第 25 届政府首脑会议上,各成员国通过了《英联邦贸易和投资互联互通议程宣言》,声称将致力于在透明、包容、公平以及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中实现自由贸易,抵制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并提出到 2030 年将内部贸易额增加到 2 万亿美元。^⑤但就目前来看,英国与英联邦的贸易规模仍很小。2021 年,双方贸易额为 1206 亿英镑,仅占英国贸易总额的 9.4%,与英国和德国的贸易总额大致相同。^⑥

英国发出的另一个重要信号则是拉拢英联邦中最重要的非“盎格鲁圈”国家——

^① 2022 年 6 月 25 日,在卢旺达举行的第 26 届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西非国家加蓬共和国与多哥共和国正式加入英联邦,使英联邦成员扩展到 56 个。

^② The UK Government, “PM Launches Major Trade Initiatives to Capitalise on Commonwealth Advantage,” June 23, 2022.

^③ William Hague, “The Commonwealth Is ‘Back at the Heart of British Foreign Policy,’” July 27, 2011,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the-commonwealth-is-back-at-the-heart-of-british-foreign-policy>.

^④ The UK Government, “UK Delivers £500m of Projects for Commonwealth Citizens,” September 9, 2020.

^⑤ “Commonwealth Heads of Government Meeting Communiqué ‘Towards a Common Future,’” April 20, 2018, <https://thecommonwealth.org/news/commonwealth-heads-government-meeting-communique-towards-common-future>.

^⑥ Matthew Ward, “Statistics on UK Trade with the Commonwealth,” July 29, 2022, <https://commonslibrary.parliament.uk/research-briefings/cbp-8282/>.

印度。印度不仅人口约占英联邦总人口的一半,而且据估测,其GDP将在2023年超越英国,成为英联邦中最大的经济体。^①到2030年,印度还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以及第三大经济体。^②英国要想领导英联邦,必须先笼络住印度。2021年5月4日,在英国的号召下,英印举行虚拟峰会,首次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不仅达成价值10亿英镑的贸易和投资协议,还达成强化经贸、科技、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的所谓“2030年路线图”。^③2022年4月21日至22日,在英首相约翰逊访印期间,双方领导人宣称将在2022年10月前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并致力于将防务与安全合作转变为英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关键支柱。^④

但是,英联邦国家并不十分欢迎英国成为其领导者。它们谴责英国此角色扮演是新殖民主义的象征。^⑤客观来看,英联邦不仅定位模糊,且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况且英国在自身实力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向英联邦投入资源的能力和意愿也将非常有限,这更引起英联邦国家的广泛质疑。譬如,英属维尔京群岛就指责英国脱欧使其失去进入欧盟单一市场的重要节点,以及来自欧盟的双边和区域援助。^⑥脱欧后,英国与英联邦国家的关系一直受到公关灾难和法律困境的困扰。很多成员国已表现出对英联邦的离心倾向。2021年11月30日,加勒比海岛国巴巴多斯宣布解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家元首职务,正式脱离英联邦并成立共和国。^⑦2022年3月23日,牙买加总理霍尔尼斯对来访的英国王室直接表达了将牙买加改制为共和国、终结英国女王国家元首职务的诉求。^⑧这些情况使得查尔斯王储不得不在第26届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上承诺,英联邦国家选择何种政体以及是否以英国女王作为国家元首,将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⑨这一波的“改制”热潮或将成为削弱英联邦体系合法性和权威性的

① “World Economy to Top \$100 Trillion in 2022 for First Time: Report,” Reuters, December 26, 2021,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world-economy-top-100-trillion-2022-first-time-report-2021-12-26/>.

② DataBank,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population-estimates-and-projections>.

③ The UK Government, “Joint Statement on India-UK Virtual Summit, 4 May 2021: Roadmap 2030 for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May 4, 2021.

④ The UK Government, “UK-India Joint Statement April 2022: Towards Shared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through National Resilience,” April 22, 2022.

⑤ Jonathan Lis, “To the Commonwealth, ‘Global Britain’ Sounds Like Nostalgia for Something Else,” *The New Statesman*, February 25, 2017.

⑥ Peter Clegg, “Brexit: Can the Commonwealth Fill the Gap?” January 22, 2019, <https://www.e-ir.info/2019/01/22/brexit-can-the-commonwealth-fill-the-gap/>.

⑦ 《巴巴多斯脱离英联邦成为共和国》,新华网,2021年11月30日, http://www.news.cn/world/2021-11/30/c_1128117326.htm.

⑧ Amelia Gentleman, Maya Wolfe-Robinson and Kate Chappell, “Prince William Speaks of ‘Profound Sorrow’ for Slavery in Address to Jamaican PM,” *The Guardian*, March 24, 2022.

⑨ Jamie Grierson and Rajeev Syal, “Charles Tells Commonwealth Leaders Dropping Queen Is ‘for Each to Decide’,” *The Guardian*, June 24, 2022.

导火索。

第六,民主价值观维护者。英国构建此角色,主要是为了塑造道义形象,彰显自身对全球事务的责任感。英国宣称,在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挑战下,全球民主正加速衰落。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颁布的数据,2021年全球民主指数总体得分仅为5.28,创下自2006年首次公布该指数以来的最低值。2021年,全球只有45.7%的人口生活在民主国家中,而37.1%的人口生活在独裁统治下。^①对此,英国作为所谓的“向善的力量”(a force for good),宣称要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来践行法治、保障人权,共同维护自由民主价值观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曾任英外交大臣的杰里米·亨特就提出,英国作为议会民主的发源地,在脱欧后理应成为联结全球民主国家的“无形链条”(invisible chain)。^②

英国首先在G7峰会及全球民主峰会上释放信号。2021年6月11日至13日,G7峰会在英国康沃尔郡举行,澳大利亚、印度、韩国及南非等非G7国家也受邀参会。而此前英国首相约翰逊就高调提出G7应联合澳、印、韩三国组成“民主十国”(D10),以求在5G技术及供应链建设等方面通力合作。在英国的鼓动下,与会的11国领导人与欧盟领导人签署了一份关于“开放社会”(Open Societies)的联合声明,承诺共同维护自由民主国家的基本价值观,保护和促进个人人权、民主治理、法治及言论自由等。^③2021年12月9日至10日,美国主持召开以“对抗威权、打击贪腐、保障人权”为主题的全球首次民主峰会。会议上,约翰逊再次宣称,民主不仅仅是一种理想,更是创造自由探索氛围的最佳方式。英国要与伙伴国紧密合作,来确保新兴技术用以维护自由、开放的价值观。^④

其次,英国通过制裁“侵犯人权的”国家及个人来表明决心。2020年9月29日,英国指控白俄罗斯总统选举被暗箱操纵,随即宣布对白俄罗斯包括卢卡申科总统在内的8人实施制裁。^⑤2021年2月25日,英国对军事政变后的缅甸军方将领实施制裁,谴责他们对平民抗议者实施暴力行为,并宣布英国企业将不再与同缅甸军方存在关联

^① “Democracy Index 2021: The China Challenge,” https://www.eiu.com/n/campaigns/democracy-index-2021/#mktoForm_anchor.

^② The UK Government, “An Invisible Chain: Speech by the Foreign Secretary,” October 31, 2018.

^③ European Council, “2021 G7 Leaders’ Communiqué: Our Shared Agenda for Global Action to Build Back Better,” June 13, 2021,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1/06/13/2021-g7-leaders-communication/>.

^④ The UK Government, “PM Remarks—Summit for Democracy: 9 December 2021,” December 9, 2021.

^⑤ Patrick Wintour, “UK Imposes Sanctions on Belarus President Alexander Lukashenko,” *The Guardian*, September 29, 2020.

的企业开展业务。^① 2021年4月26日,英国又推出“全球反腐败制裁机制”,并对俄罗斯、南非、南苏丹等地区的22名个人进行反腐败制裁。^②

最后,英国还致力于国际人道主义危机应对。2022年5月,英国政府颁布《国际发展战略》,宣称将利用英国投资伙伴关系(British Investment Partnerships),与政府及私营部门通力合作,使本国成为推动国际社会更有效应对人道主义危机的领导者。文件表明,2022年英国已分别向阿富汗民众和乌克兰民众提供了2.86亿英镑和2.2亿英镑的人道主义援助。另外,英国还将与世界银行积极合作,在未来15个月内提供1700亿美元,以帮助各国应对乌克兰危机。同时,英国还承诺未来每年将根据法案审查确认是否有可能根据最新的财政情况恢复将国民总收入的0.7%用于官方发展援助,而且会继续支持将国民总收入的0.2%援助最不发达国家的目标。^③

然而,英国的这种角色扮演并未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英国打着民主旗号对他国指手画脚,实则是想插手国际秩序规则的制定以及全球治理结构的设计。这不仅表露出其“伪善”的一面,更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不满。这从近年来一些国际事件中可见一斑。譬如,2017年11月,英国就未能在联合国国际法院赢取本来志在必得的法官席位。这是国际法院自1946年成立以来,首次没有英国法官。^④

以上是英国脱欧后努力扮演的六种国家角色。由于角色概念的模糊性,以及国际社会的异质性和国内政治的复杂性,本文无法明确英国的主导角色,或是其所扮演的每个角色的必要性及相对权重。英国未来将优先考虑哪些角色,舍弃哪些角色,只有通过它与国际、国内观众的多轮互动及博弈后才能明确。

(三)角色冲突与当前困境

英国的角色定位及角色行为正在引发其角色冲突。这主要源于:其一,英国试图扮演的各角色之间的内在紧张性;其二,英国国家角色的自我认知与他者期望的不一致。譬如,在英国所扮演的这些国家角色中,美国忠实盟友角色和英联邦领导者角色之间不兼容,因为后者的角色设定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美国的全球霸权。欧盟区域伙伴角色也很难与全球贸易大国角色同步,因为前者意味着要接受欧盟统一的关税管制,而后者则意味着要与非欧盟国家达成更自由的贸易协议。“盎格鲁圈”协调者角

^① The UK Government, “UK Sanctions Further Myanmar Military Figures for Role in Coup: 25 February 2021,” February 25, 2021.

^② The UK Government, “The Global Anti-Corruption Sanctions Regulations 2021,” <https://www.legislation.gov.uk/uksi/2021/488/contents/made>.

^③ The UK Government, “The UK Government’s Strateg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May 16, 2022.

^④ Owen Bowcott, “No British Judge on World Court for First Time in Its 71-year History,” *The Guardian*, November 20, 2017.

色面临着集体行动困境的难题,而民主价值观维护者角色则容易被视为别有用心
的“政治作秀”。同时,英国在构建角色的过程中,有时还发出自相矛盾的信号。譬如,
在对华关系上,英国一方面在价值观问题上态度强硬,认为中国崛起对其价值观构成
“系统性挑战”,另一方面却又屡次展望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前景。

英国角色扮演的另一大掣肘因素来自国内观众的不同偏好。首先,国内各政党对
英国国家角色的观点各异。英国政治的对抗性迫使主要政党相互反对,并造成他们对
国家角色的不同偏好。而国家角色的战略性变化,往往也反映出某个党派的崛起或政
府结构的变化。其次,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对国家角色概念亦存有分歧。普通民众大多
受到历史文化和先验信念的影响,而决策者主要考虑现实利益。^①因此,决策者通常
会在认知本国地位的基础上,平衡多方利益来塑造国家角色,以激励联盟成员,安抚反
对党,平息公众舆论。最后,普通民众还可划分为鹰派观众和鸽派观众。他们通常根
据不同的主观推测与个人印象来支持不同的国家角色。一般来说,鹰派观众偏好强硬
的国家角色,鸽派观众偏好温和的国家角色。决策者考虑自身在位安全,会根据具体
情境去迎合不同派别的观众。^②这也说明英国国家角色的确立是国家内部权力制衡
或政治斗争的妥协结果。

根据英国现有实力,其追求全球性大国地位困难重重。一方面是经济实力的制
约。2021年,英国GDP为3.19万亿美元,居全球第五位,仅占全球GDP的3.3%。^③
近两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英国国内还面临通货膨胀、能源短缺、失业加剧、社会贫
富分化、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难题。对此,约翰逊政府实施经济刺激和就业保护,结
果导致政府财政赤字大幅增加,公共债务规模急剧膨胀。截至2021年末,英国公共债
务高达2.34万亿英镑,约占当年GDP的96%。这也是英国公共债务规模自1960年
代以来的最高水平。^④2022年5月,英国通货膨胀率飙升至9.1%,创40年来最高值,
且英格兰银行警告称今年的通胀可能上升到11%。^⑤财政负担的日益沉重,加之脱欧
给英国产业链、供应链、劳动力供给带来的系统性压力,让本就呈下行趋势的英国经济
雪上加霜。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甚至预测,2023年英国将成为二十国集团

^① Robin Niblett, “Global Britain, Global Broker: A Blueprint for the UK’s Future International Role,” Chatham House, January 11, 2021.

^② Frances Yaping Wang, “Barking Without Biting: Understanding Chinese Media Campaigns During Foreign Policy Disputes,” *Security Studies*, Vol.30, Issue 4, 2021, pp.517-549.

^③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

^④ Ben Pimley, “UK Public Finances: What Do the Latest Data Tell Us?” February 15, 2022, <https://www.economicobservatory.com/uk-public-finances-what-do-the-latest-data-tell-us>.

^⑤ “U.K. Inflation Rate Hits a New 40-year High of 9.1%,” June 22, 2022, <https://www.npr.org/2022/06/22/1106659122/uk-inflation-rate-hits-a-new-40-year-high-of-9-1>.

(G20)中增长最低的国家。^①

另一方面,国内民众对英国承担过度国际责任的做法越来越持有怀疑态度。这种迹象早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和2008年次贷危机中就已显现。2011年,国内民众更是公开表达对英国在利比亚执行的轰炸行动的不满。他们认为英国政府应减少全球承诺,特别是减少海外军事干预,除非英国领土或英国资产遭受直接攻击。^② 根据英国国家社会研究中心2021年颁布的《英国社会态度》(British Social Attitudes)调研报告,2019年只有15%的受访者表示“大部分时间”或“一直”信任英国政府(是自1986年以来的最低值)。在1986-2000年和2000-2018年两个时间段内,这一数据的平均水平分别为32%、21%。^③ 这说明自2000年以来,英国民众对英国政府的信任感长期走低。

另据美国爱德曼公司《2022年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Edelman Trust Barometer 2022)显示,约79%的英国人指责政客的行为正在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自2021年11月以来,对英国政府“做正确的事”的信任度大幅下降13个百分点,降至29%。^④ 当前,在脱欧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英国民众愈发希望政府不要盲目追求大国地位,而应侧重解决社会民生问题。根据2022年6月的一项民调报告,在回答“什么是当前英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时,有65%的受访者认为是“经济”(排名最高),36%的受访者认为是“健康”(排名第二)。^⑤ 另据益普索2022年6月调研数据,69%的英国民众对政府治理国家的方式不满意,69%的民众对约翰逊首相的工作方式不满意,77%的民众认为英国经济在未来的12个月会变得更糟。^⑥ 2022年7月7日,由于英国民众遭受持续的生活成本危机,加之政治丑闻以及失去内阁的信任,英首相约翰逊被迫宣布辞去保守党党首和首相职务,但将留任至新领导人产生。^⑦ 这场政治危机又将给英国的内政外交带来更为严峻和长期的考验。

^① “David Lammy MP Keynote-Labour’s Vision for Britain in the World after Brexit,” June 23, 2022, <https://ukandeu.ac.uk/david-lammy-mp-keynote-labour-vision-for-britain-in-the-world-after-brexit/>.

^② Richard G. Whitman, “Brexit or Bremain: What Future for the UK’s European Diplomatic Strateg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92, Issue 3, 2016, pp.509-529.

^③ NatCen Social Research, “British Social Attitudes after Brexit and COVID-19,” <https://www.bsa.natcen.ac.uk/media-centre/latest-press-releases/bsa38-key-findings-press-release.aspx>.

^④ 按照爱德曼公司的计算方法,信任度1%至49%被认定为“不信任”,50%至59%为“中立”,60%至100%为“信任”, <https://www.edelman.com/trust/2022-trust-barometer>.

^⑤ Statista Research Department, “Most Important Issues Facing Britain 2019-2022,” *Statista*, June 21, 2022,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886366/issues-facing-britain/>.

^⑥ Ipsos Mori, *Political Monitor*, June 2022.

^⑦ Owen Amos, “Boris Johnson Resigns: Five Things that Led to the PM’s Downfall,” *BBC News*, July 7, 2022, <https://www.bbc.com/news/uk-politics-62070422>.

同时,乌克兰危机也对英国当前的对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对于英国来说,介入这场危机可以展示它对欧洲安全的持续承诺。因此,危机爆发后,英国在军力部署、武器援助、经济制裁等方面均冲在西方阵营前列。2022年6月16日,英外交大臣伊丽莎白·特拉斯在下议院演讲时宣称,英国是首个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欧洲国家,也是欧洲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及人道主义援助的最大单一捐助国。截至6月末,英国对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及人道主义援助总额达到近40亿英镑,并在北约东翼部署了更多的部队。^①同时,英国还对俄罗斯实施了六波大规模制裁,定向制裁了俄1000多个人和100多家企业,对俄经济造成约2560亿英镑的打击。^②这种大规模制裁还获得英国民众的广泛支持。根据益普索调研数据,超过50%的英国人认为应该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和天然气,超过75%的英国人支持对俄罗斯实施额外制裁。^③另有数据显示,约91%的英国人认为俄罗斯是英国的主要战略对手。^④另外,在西方联合制裁下,自危机爆发迄今,俄罗斯进口量已下降超过40%,后勤基础设施面临崩溃,^⑤央行资产也惨遭冻结,以至于无法动用6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⑥

早在1962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就曾总结道:“英国失去了一个帝国,但还没有找到一个角色。”^⑦时至今日,这种状况似乎仍在困扰英国政府。英国当前不合理的地位追求和角色定位,不仅会增加其对外政策的模糊性和摇摆性,还可能导致其陷入选择困境或自我膨胀。同时,英国既无法通过军事、经济等硬实力来领导或强迫其他国家服从其意志,又十分依赖盟友和战略伙伴对其的理念支持。这种实力与意图的不匹配,加之英国反复无常的对外行为必将使其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加孤立和脆弱。

对此,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荣休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认为,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中,英国必须放弃对无用角色的追求,努力成为“务实的问题解决者”(a pragmatic problem solver)及“规则接受者”(a rule taker)。^⑧在这些角色定位下,英国首先应摆脱旧帝国主义思维的桎梏,依靠强大软实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其次,应平衡好英美欧“三

① The UK Government, “PM Statement on the Commonwealth, G7 and NATO Summits,” July 4, 2022.

② The UK Government, “Russia’s War on Ukraine: Foreign Secretary’s Statement,” June 16, 2022.

③ “61% Globally Think the War in Ukraine Poses a Significant Risk to Their Country,” Ipsos, April 19, 2022, <https://www.ipsos.com/en/war-in-ukraine-april-2022>.

④ Sophia Gaston, “UK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 and Global Affairs: Annual Survey 2022,” BFGP, June 2022.

⑤ The UK Government, “UK Sanctions Russia’s Second Richest Man,” June 29, 2022.

⑥ “What Are the Sanctions on Russia and Are They Hurting Its Economy?” *BBC News*, June 27, 2022.

⑦ Douglas Brinkley, “Dean Acheson and ‘the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West Point Speech of December 1962,”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33, Issue 3, 1990, pp. 599–608.

⑧ Lawrence D. Freedman, “Britain Adrift: The United Kingdom’s Search for a Post-Brexit Role,” *Foreign Affairs*, Vol.99, No.3, 2020, pp.118–130.

角关系”,确保本国不会因更紧密的美欧合作而被边缘化;再次,应积极维护全球多边主义,充分发挥自身在联合国、北约、G20等重要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与合作伙伴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候治理、健康风险等全球性挑战;最后,应秉持实用主义原则,协助全球复原力建设,倡导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并确保对外政策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利益。

四 结语

在具有等级特征的国际体系中,国家会按照既有的权力分配、制度规则以及自身实力,寻求合适的国家地位。然后,国家会根据地位目标,匹配相应的国家角色,并进行角色扮演。而国家的角色扮演过程,也就是国家对外政策选择及调整的过程。从地位寻求到角色构建再到对外政策调整,是国家从认知到行为的一条完整的传导路径。因此,国家地位、国家角色概念越清晰,国家对外行为逻辑就越明确。

脱欧是英国在二战结束以来做出的最重要的政治决策之一。它将重塑英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全球角色,并成为英国对外政策取向的根本转折点。作为老牌殖民帝国,英国始终无法忘怀大英帝国的往日辉煌,总是谋求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扩大对全球的影响力。同时,“英国例外主义”的意识形态也使得英国时刻提醒自己必须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而不能仅仅作为一个欧洲大国。但是,英国的全球抱负却与其不断缩小的权力和资源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紧张关系。或许正如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社会学系副教授戴维·麦考特所言,英国注定只能是一个“残余大国”(residual great power)。^①在全球民粹主义抬头、多边主义普遍遭遇危机,以及反全球化逆势而起的当下,英国未来的国家地位或将更多地取决于它能否摒弃浮夸的宏大战略、制定务实的对外政策,以及对解决全球问题的贡献。

(作者简介:孙志强,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英国研究中心专任研究员;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教授。责任编辑:宋晓敏)

^① David M. McCourt, *Britain and World Power since 1945: Constructing a Nation's Role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4.